

# 文化冷戰在香港： 《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 1950-1970（下）

• 傅葆石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三節已於2019年6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四至六節。

## 四 《中國學生周報》的前世今生

1952年7月25日，即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承諾予以民主中國青年大同盟(以下簡稱「同盟」)財政支持的一個月後，《中國學生周報》(以下簡稱《周報》)開始由友聯出版社出版。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亞洲基金會專檔中，看不到資料提及同盟在何時和為甚麼更名為友聯出版社。根據曾經擔任《周報》編輯的學者余英時的回憶，「友聯」的名字是一群在政治和文化上志同道合的年輕朋友聯合在一起的意思<sup>①</sup>。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裏，依靠美元資助，友聯出版社超越了此前的自由出版社，建立起一個跨國出版帝國，分銷網絡遍及東亞與東南亞。出版社還擁有自己的印刷廠，不僅出版了幾套經典暢銷且價廉易得的叢書，如「現代思潮文叢」、「世界學術叢書」，還印行中小學教材和一系列雜誌，包括《大學生活》、《祖國》、《兒童樂園》與旗艦刊物《周報》。友聯出版社同時經營友聯研究所，收藏了大量有關共產主義中國的重要研究資料(如剪報和地方出版物等)。在1980年代中國向西方世界開放前，友聯研究所幾乎成為來自全球各地的中國研究者的學術聖地。

相比其前身「民主中國青年大同盟」，「友聯出版社」的命名明顯弱化了冷戰基調。同時，出版社也試圖將《周報》打造為一種淡化政治色彩的文化啟蒙媒介，擁護自由世界，聯合世界各地的華人青年，凝聚成一股重塑中國的力量。在《周報》的三位發起人(陳思明、徐東濱和余德寬)中，只有余德寬此前在自由出版社從事報紙出版工作，具有一定的編輯經驗。他後來向年輕讀者解釋匆忙草創刊物的原因時說道：「本報創刊的時候，正是歷史逆流淹沒了我

們的祖國，中國的文化遭受着徹底的破壞，人類文明面臨着空前的危機。國內的同學們在受着統治者的毒害、奴役、蒙蔽和控制，海外的同學們大部都悲觀、苦悶、頹喪和消沉。……當初，我們為惡劣情勢的逼迫，為責任感的驅使，才鼓起勇氣，在極艱苦的條件下，創辦了這份刊物。……中國學生周報的讀者對象是各級學校的中國學生……以較多數的中學同學為主……〔這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使我們苦難衰老的國家充滿了活力。」②《周報》編者將他們自己視作中國自由主義的良心，致力於一項提倡新思想和新生活方式的「文化運動」，使中國轉變為一個真正意義的「現代國家」③。這些似曾相識的論述，表明友聯出版社知識份子的思想源自二十世紀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他們追求自由和民主啟蒙，抵制文化的工具化，反對專制意識形態，讚頌青年的力量，希望成為中國轉型的推動者。《周報》明確而堅定地動員青年知識份子加入他們的事業，正是這一立場，將《周報》與其他「第三勢力」的文化產品區分開來，並由此產生了長遠影響。

《周報》認為，政客的操縱干預是造成此前中國文化啟蒙失敗的重要原因，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周報》致力於為全球的中國學生提供一個自由獨立的平台。正如編者在創刊詞中宣稱，《周報》「是為海內外全體中國學生而服務的。因此我們可以不受任何黨派的干擾，不為任何政客所利用。在這裏，我們可以暢所欲言，以獨立自主的姿態，討論我們的一切問題……只有在這種自由的園地裏，才可以充分表現我們的意志，才可以充分闡揚我們的理想」④。編輯不僅承諾建立一個自由的平台用以公開討論，還倡導超越當下的政治訴求，進行獨立思考。對青年難民而言，第一要務便是在社會動盪中生存下去。新亞書院歷史系教授余天柱指出，在國際紛爭的大環境下，最大的問題莫過於「向左或向右」。他呼籲讀者在作出選擇時，應當保持獨立思考，客觀地了解冷戰背後不同意識形態的真正差異。他藉此巧妙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共產主義不尊重民意，是一種專制而邪惡的意識形態。儘管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着諸多問題，如經濟不平等和利己主義，但在當代世界的意識形態衝突中，資本主義更為可取，因為它包含了

普世價值：民主、個人自由和人權⑤。同樣，《周報》亦通過堅持沿用中華民國的民國紀年，拒絕使用北京的西元紀年，以及在顯著位置刊載暗含政治褒貶的有關中美高等教育近況和校園政治的新聞敘述（如讚揚美國的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和民主理念），間接地表達出反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傾向。這樣一來，利用備受尊敬的學者——特別是新亞書院的學者——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推崇「客觀化」的獨立思考，《周報》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強烈的反共基調，爭取廣泛的社會認同。

《周報》擁護西方的自由主義觀念，與其依戀中國傳統文化有關。在對待傳統與現代的關



《周報》致力於為全球的中國學生提供一個自由獨立的平台。（圖片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提供）

係這一命題上，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自由主義文學家與思想家，大多主張徹底摒棄傳統（儒家）文化，重新想像中國的民主進程。但友聯出版社的青年知識份子則認為，二者的關係複雜多義，且充滿對話性。這些青年歷經流離顛沛，又深深懷戀故土，他們既是西方民主的堅定信徒，也是中華文化的熱切捍衛者。正是反共運動將這兩種身份認同匯聚在一起。刊物創始之初，他們的導師、新亞書院奠基人錢穆便懷着對延綿不絕的中華文化矢志不渝的信念，認為中華文化與當代世界緊密相連，並以此為《周報》定下了文化基調。在〈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國青年們〉這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中，錢穆指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都處在西方的主宰之下，積貧積弱，歷經屈辱，人們對民族的未來感到迷茫，並因此普遍產生了悲觀態度，抨擊中國文化傳統。他嚴厲批評了這一傾向，認為即便中國「赤化」，向蘇聯一面倒，也仍然在世界舞台上佔據舉足輕重的一席之地，因為中國悠久連綿的文明創造了一種固有的力量，錢穆稱之為「中國的力量」。正是這一力量鼓動我們，在二戰中抗禦暴日。顯然，這段陳述是在回應艾奇遜（Dean Acheson）在《中美關係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中討論毛澤東是否會成為中國的鐵托（Josip B. Tito），以及是甚麼導致了「失去中國」的問題。在錢穆看來，回應地緣政治的問題，需要將其置於中國的文化傳統之中。他呼籲青年讀者珍視自己的文化遺產，反抗共產黨在大陸對文化的「刻意摧殘」，擔當起這一「巨大的責任」，承續和弘揚離散的中國文化<sup>⑥</sup>。

友聯出版社的知識份子以《周報》為橋樑，廣泛連接散居各地的華人讀者，表現出他們忠實於文化中國的理想。他們建立了一個跨越國界的知識份子共同體，追求西方的自由民主。在這裏，所有具有相似民族特徵（即「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的青年知識份子，以「炎黃子孫」的共同名義相聚在一起，彼此交流，互相分享。正如《周報》的編輯告訴讀者，「雖然，我們和大多數的讀者和通訊員，都是素未謀面的，但我們間的情感，藉本報得以溝通……最主要的是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有着共同的理想——維護中國的文化和復興中國的國運」；《周報》「決不囿於地緣的限制……希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每一位中國學生，都能透過這份報紙，使大家在精神上和努力的方向上，更能團結起來！」「只要我們懷着信心和團結，在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永遠不會孤單的。」<sup>⑦</sup>

一面是青年的理想主義和自由主義願景，一面是對美國的資金支持保持緘默。在華語世界的冷戰文化鬥爭中，友聯出版社和《周報》幕後秘密的美元支持及其實質關係，成為了最具爭議性的部分。儘管友聯出版社的辯護者，如友聯負責人之一奚會璋與亞洲基金會香港主持人艾偉（James Ivy）關係非常密切，一再強調資金的使用並無任何附帶條件；即便沒有美國的支持，他們也會舉辦同樣的活動，但仍有批評者指出，友聯出版社的知識份子是美国文化帝國主義利益的「工具」<sup>⑧</sup>。正如所有二元對立的思維一樣，每一方都有各自的立場和道理，然而兩者都主要出於個人記憶和政治推測，其邏輯顯然過於簡單化。

返回檔案材料並系統閱讀《周報》，可以更好地了解其中複雜微妙的關係。如上所述，亞洲基金會的主要目標是海外華人，而香港的重要性正體現

在它是難民知識份子群體匯聚的區域性中心，他們在此與共產黨人展開鬥爭，爭取東南亞華人的「民心」。正如另一份亞洲基金會文件所解釋，「大家都公認香港有很多傑出的人才和領導者，他們可以對海外同胞們施加影響」<sup>⑨</sup>。此外，亞洲基金會資助了諸多香港難民群體和文化教育活動，包括著名的新亞書院、泛亞通訊社 (Pan-Asia News Agency)、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等項目，同時將其作為青年招待所和師生交流平台<sup>⑩</sup>。友聯出版社的美元支援是亞洲宣傳戰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上篇提到徐東濱給艾偉的信，便清楚說明友聯出版社的一些創始人從一開始便深知他們正參與美國的反共鬥爭，而且是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戰場——意識形態鬥爭。為使文化冷戰中的雙方合作取得成功，他們相信這種合作必須是秘密進行的，尤其是關於美元支援的情況。艾偉在1952年7月25日《周報》創刊後立即致函舊金山總部，指出雜誌的使命是「在東南亞成功打開銷路……，是為了保護這裏的學生，我們發行出版的真正目的應該成為秘密」<sup>⑪</sup>。他後來在一封密件中進一步澄清：「〔只有《周報》的主編了解亞洲基金會的幫助……學生購買雜誌是因為它傳達了自由獨立的思想。〕倘若雜誌接受資助的事情人盡皆知，讀者會對其興趣銳減，甚至不屑一顧，因為它的存在似乎只是為了宣揚一種外來的觀點。」<sup>⑫</sup>

《周報》自創始之初便成為美國發起的秘密「文化戰爭」的工具。在大聲呼籲避開政治影響、倡導自治自由的同時，友聯出版社的成員對於他們與美國之間的資金牽連避而不談。從他們定期續簽的協議來看，亞洲基金會每個月提供8,000港幣的支持（最初是7,500港幣），使《周報》能夠成為一個（在高中生群體中）更加有效的宣傳工具，讓他們更好地擁護自由世界的理念和原則。有了美元的支持，《周報》強調，第一，雜誌的讀者群是東南亞的海外華人；第二，雜誌要努力繼承和弘揚中國文化價值觀，抵抗中國共產黨的反傳統主義。最重要的是，雙方都承諾，要盡全力為美元援助的事情保密<sup>⑬</sup>。

舊金山方面還要求，《周報》和友聯出版社的所有活動都需要在香港政府註冊，並遵循相關準則。事實上，檔案材料顯示，與中央情報局 (CIA) 等其他美國政府機構明顯不同，在某種程度而言，美國新聞處 (USIS) 經常與香港政府發生衝突。相反，亞洲基金會則盡力與香港殖民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工作關係。但香港當局似乎一直對亞洲基金會充滿警惕，擔心亞洲基金會針對青年人的宣傳活動，以及利用香港進行跨區域的文化宣傳和教育交流聯合東南亞華人群體的做法，很可能會惹惱中國政府。因此，以艾偉為代表的亞洲基金會地方官員，定期與香港總督或其政治顧問和警察政治部官員會面，向他們匯報最近的活動，尋求共識與支持。在1954年港督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 訪美期間，亞洲基金會在舊金山灣區招待了他，希望能夠藉此贏得香港政府對文化冷戰的更大支持。這至少部分反映了《周報》在1970年代之前幾乎從未與殖民政府（或廣而言之——殖民主義）產生衝突<sup>⑭</sup>。

友聯出版社的領導人一方面公開倡導獨立與自治，另一方面不讓任何人得知他們與美國的關聯，不僅對讀者保守秘密，對出版社的編輯員工和學生志願者也是如此。例如，當時剛剛畢業於新亞書院的古梅，與許多學生積極份子一同從事《周報》的初級文字編輯工作，他們對出版社背後的金主一無所



知。《周報》的重要編輯羅卡（劉耀權），在1962至1967年間為《周報》開闢電影版，培養了忠實的讀者群，對此事同樣不知情。他們當時很自然地推斷，《周報》的經營依靠的是其銷售額<sup>⑤</sup>。友聯出版社的創始人很可能將美元的秘密資助視作消滅共產主義的權宜之計。他們期待，配合着他們的文化運動，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會由此建立。但無論他們怎樣勸說自己相信，這仍舊只是謊言和權術，這也使參與其中的人都陷入了內疚和自我懷疑之中：他們是被動地捲入亞洲宣傳戰的共犯嗎？是幫助美國在亞洲華語地區進行文化擴張的帝國主義特工嗎？抑或他們只是無辜的理想主義者，在超級大國勢同水火的衝突年代，對出版背後的政治毫不知情？

不過，友聯出版社的一些關鍵領導人仍然覺察到了美國的隱秘支持。例如，於1950年代早期加入《周報》的新亞書院學生孫述宇和王健武在最近的採訪中表明，當時略微了解資金的來源，但並不覺得不妥，因為資金的使用並無附加條件，亞洲基金會從未干涉過友聯出版社的活動。和他們有類似想法的還有林悅恆，他畢業於台灣大學並長期擔任《周報》主編，因在工作中給予員工最大程度的自由而著稱。林悅恆認為，無論有無美元的支持，友聯出版社的自由主義者發行雜誌或出版書籍，都不是為了服務於美國的冷戰議程，而是為了追求他們自己的理想，重造一個「民主中國」<sup>⑥</sup>。這些自我辯護都指向了這場爭論的癥結所在：在何種程度上，《周報》與友聯出版社是亞洲基金會控制下的宣傳工具？換言之，這群流亡知識份子在文化冷戰中是否具有自己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為擴大美國在亞洲的影響，亞洲基金會在投資方面十分謹慎。在為友聯出版社提供資金支持期間，也資助過其他各類項目與活動。在亞洲基金會主辦的各種刊物中，《周報》最令其滿意。亞洲基金會為了掌控《周報》的政治立場，1952年11月的協議明確規定：「出版物必須接受來自亞洲基金會代表們關於雜誌內容和行政事務的建議。」<sup>⑦</sup>這一點不難找到證據。在《周報》面世五天後，中國關係部的P. C. Liu（中文名不詳）向主管亞洲事務的斯圖爾特（J. Stewart）提交了一份報告，詳盡翻譯了《周報》的文章，以表明《周報》「平和理性」的風格背後，有着無可爭辯的反共「內核」。這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有利於基金會在亞洲「打入中國學生團體內部」。兩周後，《周報》編輯部的華籍工作人員再次進行了出版評估，一致認同《周報》是同類雜誌中的最佳範本，建議舊金山總部從美國的刊物中選取文章提供給《周報》<sup>⑧</sup>。因此，特別在最初幾年時間裏，《周報》上充斥着各種關於開放、自由的美國校園的新聞報導（如斯坦福大學為國際學生設立獎學金以增加跨文化交流），以及關於中國學生和學者在美國校園的愉快生活（如在紐伯里學院 [Newberry College]，中國學生以優異成績打破了美國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這些消息很典型地反映了含混駁雜的冷戰意識形態，表面上顯現出「亞洲色彩」，但其消息的來源及其背後的冷戰邏輯卻從未被清晰分辨。

亞洲基金會將《周報》視為向中國學生傳播美國故事的主要載體。隨着《周報》銷量的日益增長，它迅速聯合了各種有影響力的社團組織，並在1953至1954年間擴展到東南亞各國，亞洲基金會對此驚喜異常。1955年2月，亞洲

區負責人斯圖爾特興奮地告訴艾偉，「共產主義在印度極速擴張，面對這一嚴峻的問題，並無一蹴而就的辦法。但你們現在與《周報》的努力，指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並提供了振奮人心的範例〕」<sup>①</sup>。同年，舊金山總部將《周報》的定位從香港的本地雜誌上升為中國的區域項目，《周報》成為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中心陣地。在1958年的一份內部備忘錄中，亞洲基金會將《周報》與友聯出版社的其他項目，以及亞洲基金會資助的另一些出版物區分開來，認為《周報》團體是「在香港和東南亞抵抗共產主義擴張最有效的學生組織」，為「培養亞洲自由世界的實力」做出了重大貢獻<sup>②</sup>。

1952年《周報》剛剛開始發行時，銷量約為1,800份，而後降至約800份。但是在短短一年時間內，發行人量又一度增至12,000份。一位編輯將這一近乎十倍的銷量增長歸功於一項巧妙的營銷策略，即利用學生志願者向中學直接分銷雜誌。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的創立，更推動了《周報》在海外華人群體市場中的銷情，如台灣、馬來亞、越南、泰國和朝鮮等<sup>③</sup>。這一說法不無道理，但或許忽略了另一重要因素，即這本雜誌1至2角港幣的低廉定價。冷戰期間，香港的意識形態鬥爭激烈，如何爭取社會各階層的支持，讓窮困的家庭也能負擔得起購買雜誌的費用變得異常關鍵。有了美元補貼，《周報》得以廉價出售。事實上，從最初的財政支持協議開始，亞洲基金會就考慮到《周報》絕非可以自給自足的項目。為了盡快爭取更多的讀者，迅速擴大美國在地區的影響力，亞洲基金會提供了重要的財政和物流支持，幫助《周報》建立海外銷售網絡。例如，艾偉曾要求新加坡的亞洲基金會代表協助燕歸來的東南亞調研。他還將《周報》的創刊號寄送給亞洲各處的官員，希望他們努力推動《周報》在當地的銷售。艾偉認為：「這群〔《周報》的〕學生在大陸有着各式各樣的經歷，是大陸共產主義破壞力量的見證者，他們已經形成了為自由民主事業奮鬥的激進精神，立志推翻中國的紅色政權。他們向海外青年傳達了重要信息。」在艾偉看來，協助《周報》「盡可能地擴大在海外華人群體中的發行傳播」，正是亞洲基金會的重要使命之一<sup>④</sup>。

整個1950年代，《周報》的銷售額都在持續攀升。1957年的發行人量達到15,000份（也有人說30,000份）<sup>⑤</sup>，而當時大多數雜誌的銷量僅為3,000至5,000份。《周報》迅速發展為跨境刊物，其市場擴展到東南亞和葡萄牙殖民地澳門。1954年2月，亞洲基金會華籍顧問袁倫仁（L. Z. Yuan）讚揚了《周報》在香港成功舉辦的中學生徵文比賽。他建議舊金山總部在東南亞各國設立《周報》本地版，可以從受共產主義影響最大的印尼開始。亞洲基金會認為，《周報》建造了一個最有效的反共平台，不僅由於它的內容，還在於如艾偉所言，它成功舉辦的各種活動「極大增強了出版物的效果和影響」<sup>⑥</sup>。《周報》從其讀者中招募了大量的「通訊員」，讓他們根據個人經驗提供素材或撰寫與學生生活有關的內容，並將《周報》分發給同學。這些熱心的學生志願者通過加入《周報》組織的各種活動和興趣小組，如運動比賽、郵票小組、戲劇團、文學小組和學術組等，形成了緊密的共同體。在生活條件差、青少年娛樂和社交活動受限的情況下，這些「通訊員」成為《周報》不斷擴大新版圖和吸引新讀者的中堅力量。

1954年中期，印尼設立了《周報》本地版後不久，《周報》便迅速擴展至馬來亞、緬甸、泰國和澳門。在亞洲基金會資助下，余德寬和奚會暉與友聯同仁分別到這些地區進行考察。他們發現，基於對《周報》跨境拓展的考慮，本地版的設置是精心策劃的，同時也是一種政治姿態的表達。在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的一系列信件中，余德寬記錄了他對馬來亞和新加坡政治局勢的觀察與思考。這些見聞主要來自與當地文化精英的會面。他們與余德寬類似，或是高中老師、大學教授，或是報紙編輯、政府中層官員。余德寬得出了兩個關鍵結論，解釋了為何《周報》必須設立當地的辦事處：首先，雖然政府「絕對是反共的」，但大多數受過教育的青年都對中國共產主義表示同情。馬來亞處於轉變為紅色政權的危機邊緣，有可能成為「第二個印尼」。其次，友聯出版社的知識份子可以有力地解決這一情況，因為該地區的華人群體視他們為「救世主」。余德寬確信亞洲基金會所斷言的香港將成為美國「文化戰爭」的生產中心，頗為滿意地寫道：「這裏的人們特別尊重香港人。他們認為來自香港的一切都是好的。」他認為，為了吸引更多讀者，馬來亞的《周報》應當減弱反共傾向，同時也主張《周報》絕不能淪為國民黨政府的工具，因為蔣介石政權「無法為反共學生提供領導」，這些均表明了「第三勢力」的立場。燕歸來前往仰光參加美國贊助的「亞洲文化自由會議」時，婉拒出席當地親國民黨的活動，而余德寬也拒絕了在由國民黨控制的華僑組織中發表演講的邀請。這種激進的對當局政權的蔑視，不僅與朝鮮戰爭後美國在亞洲對共產主義的遏制政策相悖，也會在接下來與亞洲基金會產生衝突。1954年11月，《周報》推出了馬來亞版，以「健康、有趣、益於青年」為目標，標榜「本地色彩」（主要是招募當地學生為其工作）。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當地《周報》的發行人數從2,000份增至3,500份，其他地區的官員有見及此，也要求在其管轄地區分發《周報》。舊金山方面對馬來亞版《周報》的迅速成功極為興奮，希望艾偉「繼續鼓勵友聯出版社和《周報》，在東南亞更多的地區擴展他們的計劃」<sup>25</sup>。

毗鄰香港的澳門自然成為了《周報》拓展的首要目標。1954年11月，奚會暉考察澳門後，用流暢的英文和充滿冷戰意象的修辭，向亞洲基金會提交了一份關於當地青年文化的詳細調查報告。奚會暉請求亞洲基金會提供財政支持，在澳門設立分支機構。他將澳門描繪為「與共產主義往來密切的自由世界的重要前哨」。然而，由於國民黨政府能力不足，加之美國方面對此缺乏關注，共產黨的影響主導了澳門的「文化戰爭」。例如，澳門的八家書店中，只有一家書店出售非共產主義作品；絕大多數的澳門高中生在畢業後選擇到大陸繼續深造（只有5%的畢業生選擇台灣高校）。因此，友聯出版社領導層試圖在澳門建立一個穩固的立足點，重新佔領「意識形態陣地」。奚會暉提出，第一步是設立書店，可兼作圖書館、《周報》發行辦公室和讀者活動中心。艾偉很快就認可了這項計劃，並在批覆中表示，《周報》在澳門的項目將會幫助「抵抗共產主義的影響，阻止它們完全控制」澳門的青年和教育。隨後，澳門友聯圖書公司很快成立，它也被稱作「學生之家」<sup>26</sup>。

在香港，《周報》同樣處於迅速拓展的時期。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它努力在粵語群體中進一步擴大其影響。作為來自廣東以北主要用國語的少數群

體，友聯出版社的知識份子很容易被認為是外來者，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將香港殖民地政治化。正如一名新亞書院的學生在多年後回憶，她的父親因為擔心她會被「捲入政治風波」，阻止她與流亡組織的同學來往<sup>②</sup>。《周報》也試圖消解這些抵觸反響。1956年，《周報》決定為勞工家庭的孩子創建小學，一方面樹立服務本地群體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加強與本地學校網絡的聯繫。這些學校大多建在天台上，而教師則來自《周報》活動的參與者，他們以獎學金的形式獲得報酬；董事會成員包括中學校長和友聯出版社的顧問、新亞書院院長錢穆。共產黨素來以社會服務贏得香港弱勢群體的支持，《周報》為貧困兒童提供教育，正是希望藉此與共產黨相抗衡。舊金山方面欣然贊同這項倡議，並優先在左派影響較大的地區（特別是香港島）設立活動中心。1961年，《周報》擁有1,200多名「通訊員」，每周在香港的發行人數共計20,000份，若包含東南亞地區，則在30,000份左右。這一銷量輕鬆地擊敗了其競爭對手——僅有5,000份銷量的左派刊物《青年樂園》。除了在澳門和東南亞設立分支機構，出版各類本地版本外，《周報》在香港還組織了面向全球中國學生的徵文比賽（主題如「我為何學習中文」、「甚麼是現代」、「甚麼是科學」）、戲劇表演、參觀旅遊（如安排六十多名「通訊員」參觀到訪的美國海軍兩棲攻擊艦USS Kearsarge並一起與戰艦將士合照留念）、體育比賽、各種興趣小組（如集郵、創意寫作）和廣受讀者歡迎的夏令營，並經營圖書館，主要提供友聯出版社出版的各種反共讀物，以及定期舉辦有關「自由中國」和美國升學進修的資訊的展覽。由此可見，《周報》成為了亞洲基金會反對毛澤東共產主義的「文化戰爭」的典範。亞洲基金會的一份預算備忘錄中宣稱，《周報》「在香港和東南亞，被視為打擊共產黨影響的最有效的學生組織……並因此增強了自由世界在亞洲的發展實力」<sup>③</sup>。

## 五 「最受歡迎的學生出版物」

友聯出版社及其旗艦刊物《周報》究竟是不是美國在亞洲文化宣傳戰的特工？他們是否因接受了秘密的美元支持而屈從於美國對中國共產主義的遏制政策？他們是否協助美國擴大其在香港和其他地區的文化影響？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在多大程度上損害了他們追求獨立和文化啟蒙的志向？《周報》是如何針對青年讀者營造文化氛圍的？如上文的討論，這些問題並無明確或單一的答案，甚或根本無法解答。

艾偉將《周報》視作亞洲基金會的創舉，因幫助《周報》成為亞洲「最受歡迎的學生出版物」而感到自豪<sup>④</sup>，這一看法反映了亞洲基金會的態度。1952年的雙方協議，要求《周報》「接受亞洲基金會代表關於文章內容、出版、行政事宜的及時建議」<sup>⑤</sup>。但艾偉也告訴他的同事，正如友聯出版社的其他機構一樣，《周報》享有「完全的獨立和自由」，況且舊金山總部對《周報》十分滿意，「絕對信任其可靠性」<sup>⑥</sup>。事實上，沒有任何文件證據表明美方曾主動對《周報》內容或其眾多的讀者活動進行審查。相反，亞洲基金會利用其金錢力量試



圖干預友聯出版社的總體方向和管理實踐。例如，大致從1954年起，舊金山總部認為《周報》的領導層任人唯親，過度排他，他們要求刊物「超越現有優勢，大規模擴張」，以便成功實施各種泛區域計劃。特別是在1954年，應亞洲基金會的要求，友聯出版社開始大力招募大學畢業生和學生積極份子，讓他們在各種出版機構中擔任領導角色，但亞洲基金會仍抱有疑慮，認為《周報》的「領導能力尚未達到令人滿意的發展」。或許是為了回應艾偉所說的友聯出版社領導人的「自治」理想，總部也偶爾要求友聯就每個新項目進行明確溝通和事先協商，或讓該地區的地方代表同步了解其計劃的開展。總部還禁止出版社自作主張，轉移盈利刊物（如《兒童樂園》）的收入去資助其他出版物<sup>⑳</sup>。

1957年，亞洲基金會代表袁倫仁在一次會議上告知友聯出版社，基金會不滿意他們擅自把一個項目的撥款用到別的地方去，因為「儘管我們盡力不公開大家的關係，但很多人都知道我們之間的合作，我們要為友聯負責」；不知是否表示不滿，他繼續表示，亞洲基金會計劃開始削減對友聯16%的補貼，並要求《周報》的售價從每期1角港幣漲至2角，以彌補損失<sup>㉑</sup>。徐東濱等負責人大力反對，指出削減經濟援助將給友聯出版社帶來財政危機，因為此時正是出版社進軍馬來亞新聞業的時刻，而更具破壞性的是，《周報》的價格翻一番，會讓目前「只銷得3,000份」、專門抗衡《周報》的左派刊物《青年樂園》因價格低廉，得以反敗為勝。這一理由果然奏效，削減資助的計劃至少在當時被撤銷了。從1956年開始，亞洲基金會一直向香港派遣美國顧問（主要是華盛頓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博士生），按照美國學術標準所能保證的「更佳質量」，來重新編排友聯研究所收藏的有關中共的重要研究資料，以便西方學者進行研究。然而，友聯出版社的知識份子對他們被要求接受的所有培訓深感懷疑，因為他們害怕公眾會把他們和美國在亞洲「了解你的敵人」的研究計劃聯繫在一起<sup>㉒</sup>。友聯出版社與其金主之間這些緊張衝突，無疑反映了美國捲入亞洲的更大主題：它傾向於干涉盟友和支持者的事務，其政治政策和資助協議往往令人困惑，充滿矛盾<sup>㉓</sup>。

友聯出版社的知識份子是美国「文化戰爭」中反對毛澤東革命的志願兵。通過與亞洲基金會合作，他們「可靠而穩定地」爭取到東南亞地區青年華人的「民心」。這些知識份子顯然在冷戰中反對共產主義，信奉自由主義。中共征服大陸，迫使他們懷着仇恨和反感的情緒背井離鄉，並將這些疼痛和創傷的情感呈現在《周報》的字裏行間，特別是在1950年代，這類情緒的抒發最為集中和明顯。如果如錢穆所提出的，書寫一部「香港流亡史」成為當務之急，那麼《周報》實際上已成為青年流亡者的交流平台，他們在此分享流離失所的經歷和企盼家園的故事，公開控訴共產黨的入侵。這種流亡經驗也被深受青年學生愛戴的哲學家唐君毅描繪為「花果飄零」<sup>㉔</sup>，成為中國文化史上最具有前瞻性的精彩概括之一。《周報》的每一期都刊載帶有種子、花朵和樹木意味的欄目和圖像，頭版的名稱有時也以綠色書寫，其背後的寓意呼之欲出。

《周報》將自己塑造為指引中國流亡青年掙扎求生的燈塔，持之以恆地為他們提供精神寄託和心靈指導，幫助他們在顛沛流離的世界中得以生存。三個反覆出現的主題定義了《周報》的性質：

第一個主題是強調共產主義的野蠻和反人道，特別是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顛覆了中國歷史悠久的文化傳統，使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使中國人民處於被奴役般的狀態。相反，儘管在資本主義民主體制下仍存在一些社會問題，但在給予人民財富、繁榮、自由和尊嚴等方面，則遠遠超越當時的共產主義。可見，兩個意識形態陣營的對立有如光明與黑暗、天堂與地獄，其間沒有任何中間地帶。特別是1950年代初期，幾乎《周報》的所有編輯和員工都是剛剛抵達香港的難民，《周報》每一期都會發表不同主題和體裁的各種文章，但它們都傳達了同樣的信息：共產主義在全球擴張的歷史時刻，每個人都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政治抉擇；最重要的是選擇「正確」的一面——資本主義民主。曾有作家宣告：「地球之上，現在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民主的自由世界，一個是極權的恐怖世界。我們的野心，究竟應該向那一個世界，向甚麼目標去發揮呢？……〔我們應當了解〕人類生在地球之上，原來有其天賦的自由，很自然的結合成一個自由世界。……蘇俄和它的附庸國家的人民，是享受不到自由和平等的。」<sup>②7</sup>燕歸來在1956年匈牙利起義事件中也疾呼：「你們〔匈牙利公民〕冒着生命的危險，向違反民主的共黨政權宣戰！……如果中國人有機會〔與你們並肩〕去匈牙利協助你們抵抗強權，我要飛奔過去報名！」<sup>②8</sup>他們謳歌民主、自由，鞭撻專制、獨裁。他們爭取民心的呼聲，洋溢着豐富昂揚的情感，躍然紙上，正如編輯孫述宇所言：「〔我們〕希望能夠給他們〔讀者〕最好的教育……反共我們當然是……」<sup>②9</sup>

第二個主題是對中國文化生命力的訴求。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盡一切可能摧毀傳統，背離中國文化，而《周報》正與之形成鮮明對照。《周報》認為，中國人民，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大陸以外的中國人，應該全心全意地投身於繼承和保護他們的文化遺產，這種遺產包括語言、歷史、社會風俗和家族倫理觀念。錢穆的觀點常被引述：只有通過學習中國歷史的得失，在與其他國家文化的比較中明白中國歷史的獨特性和發展規律，即中國的「歷史傳統和文化精神」，才能讓中國人了解自己是誰，來自哪裏，為何與其他民族文化有所不同<sup>③0</sup>。儘管當下的中國處於可悲的境地，人們卻仍會充滿希望地看待未來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換言之，當地理疆域意義上的中國陷入困境、承受苦難，對於離散在全球的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能在文化中國的維度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獲得慰藉，安身立命。這種流行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被編輯胡菊人捕捉到並傳達給了讀者，這也是他在論述《周報》的使命時提及的：「喜愛中國學生周報的人，都喜歡把她比擬作一棵樹。……〔因為樹〕堅忍不拔、永遠向上、生機蓬勃……她永遠固定在一點上，永遠不脫離其鄉土。……她永不忘本！……在這中華民族處於風雨飄搖、中國文化臨於絕續存亡關頭的今天，中國學生周報不遺餘力的宣揚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喚起海外華僑青年的愛國心，呼籲青年對中國的優秀文化要抱有熱愛，對中華民族要抱持深厚的感情。」<sup>③1</sup>這一說法正與唐君毅「花果飄零」的比喻不謀而合，它同時解釋了為何大量歷史典故、人物傳記，以及對中國文化基本價值觀和思想的討論，會成為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特別是忠孝和求知的品質。

胡菊人的觀點中還有一部分是關於西方啟蒙運動的看法，構成了《周報》使命的第三個主題。如他所言，樹木「絕不揚棄外來的陽光與露水。……這也

是中國學生周報所要效法的精神。中國學生周報除宣揚中國的優秀文化以外，更着重介紹西方的優良文明。她努力不懈地宣揚自由民主理念，介紹西方的科學、文學、藝術的知識」<sup>②</sup>。在冷戰的大背景下，追求西方自由的知識份子（自1920年代以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急切地表現出二元化的立場。《周報》認為，中國復興的唯一希望在於，建立一種美國式的民主管理體制，擁護人權和言論自由。為了能在流亡中實現這一目標，《周報》用人們易於理解的方式，通過讚揚西方社會的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傳統、自由民主理念和歷史文化名人，來營造一種西方自由世界的文化氛圍。事實證明，這在青年讀者中極受歡迎。此外，《周報》將辛亥革命（而不是很多論述中指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驅，因為它推翻了滿清的獨裁統治，並因此在中國掀起了摧毀「野蠻」、清除「非民主」傳統的鬥爭。另一個原因在於，孫中山在西方接受教育，他同樣有着學習西方民主的傾向。尊崇孫中山的背後，彰顯出《周報》對共和革命以及由此產生的民族國家的認同。每年10月10日「雙十節」，《周報》都會專門紀念辛亥革命，這與人們在10月1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紀念形成直接對峙。這兩大具有特殊意義的紀念活動，使香港充滿惡毒、尖銳、兩極對峙的冷戰話語，成為了一個似乎人人需要進行政治抉擇、表達政治忠誠的舞台。

然而，《周報》支持孫中山成立的中華民國、反對共產主義專制的傾向並不意味着他們擁護蔣介石的台灣政府。與中國1930、40年代服膺民主自由的第三黨知識份子，以至鼓吹民主建國的香港自由出版社同仁相類，他們一方面宣揚自由世界價值，堅決抵抗共產政權，另一方面公開抨擊自稱「自由中國」的國民黨專制統治，以及他們的政治無能和壓制人權：「今天高踞在北京城裏的人們，他們竟敢侮蔑和摧殘中國文化，竟公然倡言向俄國人『一邊倒』！這真是民族的奇醜大辱！……中國弄到今天這樣破爛的局面，在台北的那些袞袞諸公們，應該負最大的責任。可是一直到今天，他們仍沒有翻然覺悟改過自新的表現。他們自私……他們短視；看不清歷史的方向，以致對民主仍是三心二意，對自由仍是嫌惡恐懼……使今天在海外的中國人，陷入有家難奔、有國難投的困境！」<sup>③</sup>而《周報》顧問、流亡作家秋貞理更義正詞嚴指出海外中國人的悲痛：「……大陸錦繡河山卻落在崇拜俄國人的黨徒手中……中華民國是清白無垢的……可是執掌國政的那些大人先生們……自私腐化，丟了大陸到今天還不自省認錯，還是執迷專制……」<sup>④</sup>此外，如上文提及的，在鼓勵學生到台灣留學、接受高等教育（以此對抗大陸提供的高等教育機會）的同時，友聯負責人拒絕參加國民黨主辦的各種文化活動，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實際上，這種對民主理念的不妥協態度，與美國承認台灣政權的冷戰政策背道而馳。在美國看來，台灣是所謂的「不可動搖的航空母艦」，是美國領導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關鍵盟友。這種異議引起了台灣、香港和東南亞國家中一些反共勢力的不滿，導致基金會的亞洲特工譴責友聯出版社未能對「公共關係」予以關注<sup>⑤</sup>。

這三大主題相互交織而又充滿矛盾。《周報》如何在全身心地堅持傳承傳統觀念的同時，納入美國的現代文化價值的新視野，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化

革新？如何定義現代與傳統，二者之間的界限在哪裏？對這些重要問題的回應，至少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當時，關於東西方文化、傳統與現代性的關係的論爭主宰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視野。這些議題尚未解決，而在東方與西方、集權與民主的對立衝突中，中國知識份子流亡到英屬殖民地香港的特殊境遇，又為回應這些問題帶來了新的語境、動力和緊迫性。對《周報》而言，由於其目標讀者和版面格式的限制（大部分文章的篇幅介於一段到一頁之間），作者無法系統深入地討論這些反覆出現的經典命題。但他們慷慨陳詞，將這些問題轉化為一種鮮明的文化民族主義話語，呼籲要以共同的祖先黃帝為榮，他們告誡讀者，不要忘記歷史悠久而綿延不絕的中華文明和民族遺產。同為黑頭髮的、使用漢字的中華子孫應當銘記，我們的祖國在中國。儘管海外的生活物質「舒適」、精神「奢侈」，但一刻都不要忘記，為建立一個「民主中國」而奮鬥。唯其如此，才能將同胞從共產黨領導下「慘無人道」、「奴隸般的」生活中拯救出來<sup>⑥</sup>。

## 六 世代轉變，何去何從？

1960年代，友聯出版社的創辦人依然將《周報》看作連結散居各地的中國人的橋樑，通過傳播「民主中國」和文化民族主義的理念，跨越代際和地理的分界。然而，世界千變萬化，它的主要讀者群更是如此。到1960年代，隨着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以爆炸性的速度擴張，加之殖民政府的低稅收政策和國外（特別是美國和日本）商業和投資資本的大量湧入，香港已搖身一變為一個急速工業化的城市<sup>⑦</sup>。工業繁榮往往伴隨着人口革命，香港迎來了大批出生於二戰後的「嬰兒潮」一代，他們是南下難民的後代，對戰爭和流離失所的苦痛沒有直接體驗，也無法對1949年的大變動、大移散感同身受。1967年的暴動，是殖民地繼「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佔領後最為暴力和混亂的事件，把各種社會、政治問題和缺陷一一暴露。儘管如此，「嬰兒潮」一代把香港視作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城」，與羅湖河另一邊正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腥風惡雨狂掃的中國大陸截然不同<sup>⑧</sup>。相比於他們的父輩，新的一代普遍受過更好的教育，而他們面對的世界，正處於急劇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漩渦中。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是文化的全球化，尤其是當時席捲歐美的「青年文化」，掀起反建制、反傳統、反父權、反戰，追求和平、追求平等的風潮，隨之而出現的各種流行文化和生活風尚——如牛仔褲、搖滾音樂、新浪潮電影——影響所及，迅速成為一種全球現象，香港毫不例外地受到波及<sup>⑨</sup>。

在這個語境下，《周報》經歷了一段躁動不安的轉折期。儘管冷戰中意識形態的二元化對抗與核軍備競賽仍在不斷進行，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冷戰已經演化為全球大國之間的「和平共處」。毛澤東雄心勃勃的「多快好省」群眾運動——大躍進，造成遍地餓殍，生靈塗炭，大批難民越過邊界湧入香港，但共產黨的政權依然穩固。海峽另一邊的蔣介石政府則在美國援助下發展工業資本主義，並繼續推行專制統治。《周報》依然延續着從1952年以來就大力疾呼的「不忘本」，以作為中國人為傲，發揚傳統文化，奮力創建「民主中國」



的理念，但似乎陷入瓶頸。與此同時，《周報》一方面大力抨擊美國政府及其自由世界的盟友對共產主義過於軟弱，為了眼前利益不惜妥協；另一方面卻又諄諄勸導讀者要一心讀書，避開政治，「保持獨立思想」，遠離「左派活動」和共產主義出版物。如果《周報》這時期不是出現了一些改變，這本雜誌幾乎會與新一代青年完全脫節。在這些改變中，最讓人眼前一亮的是將偶爾刊載的簡短影評，擴充為定期有系統地討論當代電影文化的電影版，1962年起由編輯羅卡負責。羅卡1940年在澳門出生，1961年畢業於香港崇基學院（當時香港中文大學尚未成立）數學系，加入《周報》前，除了偶爾參加一些新亞書院的學術活動，與友聯出版社並無任何關聯。羅卡團結了一批像陸離說的「不知天高地厚……沒有辦法不讓別人尊稱一聲『傻瓜』的年輕人」<sup>⑤</sup>，包括石琪、金炳興、西西等思想活躍、觸角敏銳的「影癡」，給電影版帶來一股氣氛活躍、追求現代的青春氣色，主要是關於西方電影文化討論，以及介紹世界（主要是自由世界）電影大師和各種先鋒影像理論，令讀者耳目一新，深受歡迎。他們更進而將西方的電影理論（如作者論）運用到對華語電影的研究和批評，以及成立電影會，並開始製作獨立的實驗電影。對很多新讀者，包括後來成為作家的陳冠中而言，《周報》成為了他們邁進先鋒文化和電影世界的領路人<sup>⑥</sup>。

聘用羅卡時，正值《周報》在主編林悅恆帶領下進行代際更迭的時期，他在鼓勵創新和支持年輕編輯方面享有美譽。與羅卡差不多時候正式加入《周報》的同事（最為有名的是編輯文藝版的吳平和編輯兼作家陸離），都是在香港出生或成長起來的青年知識份子。他們與上一代流亡知識份子之間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異，這在羅卡的經歷可以看出：他剛開始工作的一個任務是撰文報導關於當時的「難民危機」。滯留邊境的難民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們逃離大陸的原因就是為了填飽肚子。但令羅卡意想不到的，他的報導被一位前輩編輯未經他同意加了一大段反共八股，大談共產黨如何不顧人道，共產主義如何處於崩潰的邊緣。有很多次，友聯出版社的一些前輩領導對《周報》上所有涉及反建制先鋒文化的言論表示不滿，所幸友聯出版社社長林悅恆給予了全力支持，有關流行文化的討論才得以繼續刊發。1967年，面對香港日益嚴峻的社會問題和經濟不公，《周報》卻不願改變空言民主自由和獨立思考的做法，這令羅卡倍感失望。特別是他在每天去上班的路上經過新蒲崗的人造膠花廠，目睹引起「六七暴動」的工人罷工，加上一些個人問題，在完成了近五年的電影版工作後，羅卡辭去編輯職務<sup>⑦</sup>。而《周報》在逐漸失去美元援助後，經過幾年掙扎，耗盡了所有收入來源，並在競爭日益激烈的資本主義娛樂文化市場中逐漸失去其影響，終在1974年停止出版。

## 七 小結

在政權更迭的大背景下，這些青年知識份子逃往香港，說着少有人聽懂的语言，懷戀着「失卻的」家園，滿身理想主義，又難掩孤獨之情。他們在一個秩序混亂的世界，苦苦尋找新的身份認同。他們是曾受美國資助而最終失敗的「第三勢力」運動中一股無足輕重的邊緣力量，旨在創建一個超越國共兩

黨的新的「民主中國」。直到他們從亞洲基金會得到直接的經濟支持後，逐漸成長壯大。他們延續此前自由出版社的經營模式，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出版（與研究資料）帝國，比此前的任何嘗試都更為成功：它在泛中華地區，幾乎影響了讀者近二十年。對其旗艦出版物《周報》的研究，揭示了它得以長久存在的原因。除了具備「第三勢力」運動中普遍缺乏的青年理想主義外，它還成功地將意識形態鬥士、精神導師和文化啟蒙捍衛者的角色合而為一，以此為流亡者建立了跨越代際的溝通橋樑。事實上，《周報》解決了流亡的政治家和知識份子，在很長時期都束手無策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將1949年大變動後離散各處的男男女女連結在一起。秘密的美元支持使刊物得以廉價銷售，青年難民得以輕而易舉地閱讀到《周報》，也讓跨越國境的銷售網絡成為可能。因此，在筆者看來，《周報》（及其出版人和編輯）並非「文化間諜」或「叛徒」，而是美國文化冷戰中對抗共產主義擴張的志願兵，他們與美國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並肩而行。同時，他們也抨擊美國外交政策中短視的功利主義和各種政治妥協。

從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前期，中國對外部世界關閉的大門緩緩打開，為了應對蘇聯的威脅，重新恢復與美國的外交關係。美國政府也出於擺脫越南戰爭困境的考慮，向中國示好。在這個中美和解的新時期，香港進入「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時代」。1970年代，政府為鞏固社會穩定，增強市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推行了眾多的青年項目和社會計劃，但《周報》和友聯出版社卻似乎已經迷失方向，愈來愈與新一代香港青年失去連結。繼承着1949年前中國的自由主義文化、「第三勢力」政治，以及多方面（最引人矚目的是地域和代際）的跨界交接，《周報》既信奉中國傳統，以散播中華文化「種子」為己任，同時服膺現代文明，提倡自由民主，甘為冷戰志願兵，它的歷史折射了殖民地香港冷戰經驗的曖昧性，亦在很大程度上凸顯了「一部香港流亡史」與中美文化冷戰互相糾纏的複雜關係。（本期續完）

秦雅萌、劉玲燕 譯

### 註釋

- ① 余英時：〈友聯諸君多來自新亞同門——《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七〉，《明報月刊》，第53卷（2018年7月），頁17。
- ② 德寬：〈漫長的行程——致敬讀者、作者和關心本報的朋友們〉，《中國學生周報》，第53期（1953年7月24日），第1版。
- ③ 〈我們的道路——本報周年獻詞〉，《中國學生周報》，第53期，第1版。
- ④ 〈負起時代責任！〉，《中國學生周報》，第1期（1952年7月25日），第1版。
- ⑤ 余天柱：〈當代青年的特殊遭遇〉，《中國學生周報》，第1期，第3版。
- ⑥ 錢穆：〈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國青年們〉，《中國學生周報》，第36期（1953年3月27日），第2版；亦可參見蕭颯：〈錢穆先生與新亞書院〉，《中國學生周報》，第69期（1953年11月13日），第8版。
- ⑦ 中國學生周報通訊部：〈給海外讀者和通訊員的信〉，《中國學生周報》，第457期（1961年4月21日），第1版。
- ⑧ Law Wing 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1.
- ⑨ “The Asia Foundation: Hong Kong” (1952-1953), Asia Foundation Collection (以下簡稱AFC) Box P-5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Youth and Related Activities” (1956), AFC Box P-58.

- ⑩ “Social and Economic Groups: Cultural” (1952-1953), AFC Box P-55.
- ⑪ “Letter to J. Stewart”, H-62 (25 July 1952), AFC Box P-55.
- ⑫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Letter to J. Stewart” (27 August 1952), AFC Box P-55.
- ⑬ J. Ivy, Agreement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in the form of “Letter to Yu Tak-foon” (20 November 1952), AFC Box P-55; “Agreement between Yu Tak-foon and CFA” (20 June 1953), AFC Box P-55; “Agreement” (30 June 1954), AFC Box P-55; J. Stewart, “Jenkins’ Conversation” (1954), AFC Box P-55.
- ⑭ 關於亞洲基金會與香港政府的關係，參見 J. Ivy, “Letter to Robert Blum” (3 September 1954), AFC Box P-55; J. Ivy and J. Stewart,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1 September 1954), AFC Box P-55。
- ⑮ 筆者與羅卡的個人訪談，香港，2016年6月18日。古梅的訪談，參見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82-102。
- ⑯ 孫述宇、王健武以及林悅恆的訪談，參見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頁106-213。
- ⑰⑱ J. Ivy, “Letter to Yu Tak-foon” (20 November 1952), AFC Box P-55.
- ⑲ P. C. Liu, “Memorandum to J. Stewart” (30 July 1952), AFC Box P-172; Ann Byington, “Letter to J. Ivy” (14 August 1952), AFC Box P-172.
- ⑳ J. Stewart, “Letter to J. Ivy”, SX-HK-882 (3 February 1955), AFC Box P-55.
- ㉑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TAF”, HK-1108 (31 March 1955), AFC Box P-55; “107-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31 July 1958), AFC Box P-57; “107-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21 March 1959), AFC Box P-55.
- ㉒ 扶搖：〈我們怎樣打開銷路〉，《中國學生周報》，第53期，第4版。
- ㉓ 亞洲基金會“Program Note”指出1953年8月該刊銷量升至9,000份，“AP-4301, Period 5.31.1961”，AFC Box P-55；J. Ivy, “Letter to Pat Judge”，S-17 (3 January 1955), AFC Box P-55。關於《周報》售價低廉的重要性，參見 Delimer Brown,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22 June 1953), AFC Box P-55; J. Ivy, “Memorandum to Field Representatives, CFA” (1 September 1952), AFC Box P-55。
- ㉔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Period 11.30.1957, 107: CSW”，AFC Box P-57; “AP-4301, Period 5.31.1961”；陳日青：〈使命重大 努力不懈〉，《中國學生周報》，第210期（1956年7月27日），第1版。
- ㉕ “L. Z. Yuan to Mr. Sullivan” (12 February 1954), AFC Box P-55; J. Ivy, “Letter to Patrick Judge” (7 October 1954), AFC Box P-55.
- ㉖ “Excerpts from Yu Tak-foon’s Letters, December 22, 1954-January 5, 1955”，AFC Box P-55; J. Ivy,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TAF”，HK-938 (24 December 1954), AFC Box P-55; L. Z. Yuan, “Memorandum to J. Stewart” (9 July 1954), AFC Box P-55; “Cultural Program Designed: Attachment” (n.d., around December 1954), AFC Box P-55.
- ㉗ Robert Hsi, “Letter to TAF” (23 December 1954), AFC Box P-55; J. Ivy,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3 January 1955), AFC Box P-55.
- ㉘ 筆者與賈麗妮的個人訪談，紐約，2014年12月23日。
- ㉙ “107-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31 July 1958), AFC Box P-57; “Hong Kong Office Memorandum” (30 November 1957), AFC Box P-57;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Period 11.3.1957”，AFC Box P-57.
- ㉚⑳ L. Z. Yuan, “Memorandum to the Representative”，HK-7 (28 August 1957), AFC Box P-57.
- ㉛ J. Ivy, “Letter to the Representative, Singapore”，S-12 (9 December 1954), AFC Box P-55.
- ㉜ J. Ivy, “Letter to Judge” (7 December 1954), AFC Box P-55; J. Ivy, “Letter to Yu Tak-foon” (20 November 1952), AFC Box P-55.

- ③④ Robert Blum,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Letter to Pat Judge" (2 July 1957), AFC Box P-57; Pat Judge,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HK-326 (3 August 1957), AFC Box P-57.
- ③⑤ 兩個突出的例子，參見 John Pomfret, *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n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6); Fredrik Logevall, *Embers of War: 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Vietna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 ③⑥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載《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2005)，頁2。
- ③⑦ 余達成：〈從「野心」說到「真理」〉，《中國學生周報》，第65期(1953年10月16日)，第2版。
- ③⑧ 燕歸來：〈給匈牙利老戰中的學生〉，《中國學生周報》，第229期(1956年12月7日)，第2版。
- ③⑨ 參見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頁131-32。
- ④⑩ 錢穆：〈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國青年們〉，第2版。
- ④⑪⑫ 胡菊人：〈像樹木一樣的生長〉，《中國學生周報》，第470期(1961年7月21日)，第1版。
- ④⑬ 〈堂堂的做一個中國人〉，《中國學生周報》，第253期(1957年5月24日)，第2版。
- ④⑭ 秋真理(司馬長風)：〈給在苦難的孩子們〉，《中國學生周報》，第323期(1958年9月26日)，第2版。
- ④⑮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1 September 1954), AFC Box P-57.
- ④⑯ 例如〈神聖的使命——獻給海外的教師們〉，《中國學生周報》，第199期(1956年5月11日)，第2版；〈惕念民族的苦難〉，《中國學生周報》，第362期(1959年6月26日)，第2版；秋真理：〈給中國青年一封信〉，《中國學生周報》，第356期(1959年5月15日)，第2版；自強：〈從一雙孤兒逃亡說起〉，《中國學生周報》，第586期(1963年10月11日)，第3版。
- ④⑰ Akira Iriye, "Historicizing the Cold War"; Hyung-Gu Lynn,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Cold War*, ed. Richard Immerman and Petra Goed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5-31; 584-88.
- ④⑱ 參見 Gary Ka-wai Cheung, "How the 1967 Riots Changed Hong Kong's Political Landscape, with the Repercussions Still Felt Today"; John D. Wong, "Between Two Episodes of Social Unrest below Lion Rock: From the 1967 Riots to the 2014 Umbrella Movement", in *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Law and Order from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ed. Michael H. K. Ng and John D. Wo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63-75; 97-113。
- ④⑲ 有關香港1960至1970年代的社會轉變，以及青年開始直面社會不公、反思殖民現實「火紅年代」的重要著作包括：羅永生：〈「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6月號，頁71-83；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Lui Tai-lok, "'Flying MPs'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a Colonial Setting: Political Reform under MacLehose's Governorship of Hong Kong", in *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76-96。
- ⑤⑩ 陸離：〈新電影 巴黎·紐約·香港〉，載羅卡主編：《60風尚：中國學生周報影評十年》(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12)，頁15。
- ⑤⑪ 陳冠中電郵，2018年7月3日。
- ⑤⑫ 筆者與羅卡的個人訪談，香港，2013年8月30日、2014年6月22日、2016年6月18日。